



祖国丛书

国民党左派的旗帜 ——廖仲恺

姜义华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祖国丛书

**国民党左派的旗帜
——廖仲恺**

姜义华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封面装帧 沈蓉男

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廖仲恺

姜义华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5 插页2 字数85,000

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3,000

书号 11074·643 定价 0.64 元

目 录

- 1 “我们是中国人!”(1)
- 2 从“国学”转向“西学”(9)
- 3 追随孙中山投入革命活动
..... (16)
- 4 社会主义学说的初步探索
..... (24)
- 5 “战云荡漾汉江潮,人尽识
天骄” (30)
- 6 在屡起屡蹶中苦斗(44)
- 7 对三民主义的重新思考 ... (53)
- 8 新的努力与新的打击(60)
- 9 联俄、联共思想的确定 ... (69)
- 10 为国民党全面改组惨淡经
营 (75)
- 11 向接受新民主主义飞跃 ... (81)
- 12 忠实执行三大政策的楷

模.....	(89)
13 黄埔军校党代表	(98)
14 同反动商团的拚搏	(106)
15 为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而 斗争	(113)
16 站在反帝斗争最前列 ...	(119)
17 为人民革命事业洒尽最后 一滴血	(124)
18 功业长存 精神不死 ...	(131)
附录 生平大事年表	(135)
 后记	 (141)

“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是中国人!!!”

这一句话,究竟蕴含着多么沉重的份量,包容着多少酸甜苦辣的滋味,在十九世纪晚期黑暗的岁月里,有谁能比那些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含辛茹苦地生息着、操劳着、挣扎着的游子,体会更深呢?

即如在远离祖国的异乡仅度过童年和少年生活的廖仲恺,“我们是中国人”这句话,在他心灵上也刻上了难以磨灭的烙印!

廖仲恺于1877年4月23日出生在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一个华侨家中。“我们是中国人!”这是他从牙牙学语时起就经常听父亲劝勉或训诫的一句话。而他的家庭和整个旧金山华侨社会曲折的经历与遭受到的无数屈辱、苦难,都使他深深感受到这句话在他身上压下了多么沉重的负荷。

旧金山,是一座新兴的城市。在廖仲恺出生前三十年,

这里还是一片荒芜，隶属于墨西哥。1848年，这里以及整个加利福尼亚方才归属美国。恰好这时在旧金山一带发现



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廖仲恺

了丰富的金矿，人们从陆路、海路蜂拥而至，荒地上树起了一座座简陋的帐篷。在短短三十年中，这里由帐篷而屋宇，由市井而城市，进而商贾云集，百物充物，旧金山飞速成长起来。

从万里外的中国广东、福建一带漂洋过海来的大批华工，为旧金山的

繁荣和整个加利福尼亚地区的开发，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参议会听证会的证词，1876年，即廖仲恺出生前夕，在美国的中国人，约在十五万至十七万五千之间。而在旧金山城区范围之内，中国居民最为集中，冬季约有六万至七万五千，夏季也有三万人左右。由于加利福尼亚州劳动力极为缺乏，中国人的到来，为美国资本家解决了这个困难。

他们大都从事最为繁重、最为艰苦的工作。他们建筑

铁路、淘金、治理涝洼地、卷烟，从事农业劳动，甚至做家庭仆役等等。加利福尼亚最主要的财富来自农业，中国人在这里建造堤堰、水坝、水闸、沟渠，大规模地排涝，平整土地，把大片涨潮时完全淹没、长满芦苇杂草的土地开垦成为良田，在上面种植小麦、葡萄和各种水果，他们每年创造的农业生产总值，约略等于这个州矿业生产的全部产值。中国人不管从事什么工作，都表现出他们是极好的工人。美国雇主们几乎无不承认，中国人实在是非常好的劳工，他们做工做得太好了。

廖仲恺的父亲廖竹宾，早年曾在香港教会学校圣保罗书院就读，后在英国汇丰银行服务，1863年调往旧金山。他在旧金山接触最多的便是淘金工。当廖竹宾来到的时候，淘金的高潮已经过去。而这项工作又极其辛苦，必须长时间在烈日暴晒或风吹雨打下露天工作，白种工人一般都不愿意干。中国工人被驱使着在许多被抛弃的旧矿穴里挖掘、淘洗。他们如果独自在那些废旧坑穴里淘采到微不足道的一点金沙，则立即要被白人驱逐，甚至丧失生命。廖竹宾算是比较幸运的一个，他是旧金山汇丰银行一名职员，但淘金工人的苦难，使他永远不能忘怀。

中国劳工为加利福尼亚州的开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法官所罗门·海登菲尔特，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特别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作证，说：“我认为加利福尼亚州的繁荣兴旺实在应当归功于来到此地的中国人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我认为，如果没有他们，我

们的港口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船，我们的土地上不会有那些四通八达、穿山越岭的铁路，我们大概会因为沒有他们而落后许多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调查中国人入境问题联合特别委员会报告书》）这些话，一点也不过甚其词。然而，尽管华工用自己的血汗浇灌了加利福尼亚繁荣之花，为资本家提供了高额利润，而华工们所得到的，却竟是充满了血腥气味的种族歧视。

当时，中国正处在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之下。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清政府的衰朽与脆弱已经充分暴露，列强正加紧蚕食中国，吮吸中国人民的膏腴。广大华工置身于遥远的海外，没有强大的祖国作坚强的后盾，得不到本国政府应有的保护，处境比其他国家的工人、移民更为悲惨。在旧金山与整个加利福尼亚州，华工的工资远远低于那些来自欧洲的移民；压在华工头上的，还有名目繁多的、专门用来榨取他们的苛捐杂税，如入境人头税、外籍矿工执照税、海关税、治安税等等，华工去世后尸体运回中国，也得缴纳死尸税。他们几乎处于奴隶一般的地位。他们的孩子不得进入白人学校就学；他们不能到白人开设的医院就医；他们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他们的人身安全也得不到起码的保障，随时都有可能被逮捕、驱逐和残杀。

随着美国西部开发工作大体完成，对于中国劳工的需要量开始减少。1873年，美国爆发经济危机，工厂倒闭，失业者剧增，萧条持续五年之久。美国资产阶级加紧煽动种族主义情绪，胡说美国工人失业是华工竞争所致，恶意挑拨

美国工人与华工的关系，连续制造排华事件。在加利福尼亚州各地，成群结队的美国暴徒在街道上见到华人便投掷石子、砖泥，或拳打脚踢，用鞭抽打，他们还放火焚毁华人的房舍，将华人从中小城镇中赶走，甚至将中国人残酷杀死。

廖仲恺的整个幼年、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这凶险的排华声浪与暴行中度过的。

1877年7月，廖仲恺出生才三个月，旧金山华人居住区就遭到流氓、暴徒一次大规模袭击。在随后两年，廖仲恺方才牙牙学语，蹒跚作步，加利福尼亚州议会修订了州宪法，在其中塞进了排华的内容，并制定了许多排华律例。比如，专门规定了华人住房立方米空气数额，强令寄葬的棺柩不得迁运回国，明令华人不许出庭作证，严禁各公司雇用华工，等等，总之，想尽办法苛待中国人，必欲尽驱出境而后快。

随着廖仲恺渐渐长大，高悬在美国华工头上的利剑越逼越近。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第一个排华法案，规定十年内禁止中国劳工入境；1884、1885年，美国西部与西北部又一次掀起排华暴动的恶浪，使广大华工风声鹤唳，无法安生；1888年，美国更明令华工凡已返国者，都不得重新入境；1889年，旧金山地区又借口中国人居住地污秽不洁，逼令唐人街另迁他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暴徒们在唐人街不断骚扰，故意制造事端；旧金山地方官也一次次借口拘禁华人，逼令迁徙；1891年，加利福尼亚州下议院通过了更为

苛刻的限制华人条例。在这些年中，华工被惨杀的事儿几乎每天都有；未死者也常常被集体驱逐，房屋被焚毁，财产被抢夺。这些野蛮的法令和强盗行径，一次又一次沉重地锤击着廖仲恺的心房。

那时，来到美国工作的中国人，绝大多数是只身背井离乡，被当作“猪仔”给半雇半骗运送前来的。在旧金山，象廖竹宾这样有妻子儿女的，在华人中只占极小的比例。旅居旧金山的中国人，基本上是广东人，他们分属六个会馆：三邑会馆、阳和会馆、冈州会馆、宁阳会馆、合和会馆和人和会馆，廖竹宾是惠阳人，惠阳县当时名叫归善，属于人数最少的人和会馆。但是，各个会馆，不论人数多少，职责都大体相同。华工初到时，会馆负责接待和安排；华工离美时，会馆代购船票；华工间发生口角，会馆力为之劝解，使各相安。各会馆摆设，都保持中国的风格；会馆章程都规定，所属成员在美期间必须继续保持中国装束，改换洋装者，册不列名，有事投诉，会馆不予受理；所属成员若为当地暴徒或官吏欺凌，会馆有义务挺身到官，代为辩护排解。会馆的这种维系与约束力量，帮助了旅居旧金山的中国人，使他们虽然长年居住在异国他乡，却不象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那样易于被同化，而长久地保持着自己原先的语言、风俗、习惯与心理。正因为如此，廖仲恺虽然出生、成长在与惠阳相隔万里的太平洋彼岸，祖国与家乡的气息，对于他说来却并不陌生。

中国人来到旧金山，虽然已经数十年，到廖仲恺出生时，这里还没有一所华人学校。直到1885年廖仲恺八岁

时，第一所华人学校方才在旧金山开办。从国内专门聘来举人、秀才，在这里执教。学校的课程虽然有不少与美国同类学校相似的内容，但是，占居中心地位的，仍旧是“四书”、“五经”等古代儒家经典著作。

廖仲恺原名恩煦，又名夷白。这两个名字，反映了他父亲廖竹宾对于儿子殷切的期望。恩煦，所期待的是能给他人以德惠，如阳光那么温暖。夷，古指安心好静；白，古指素净明洁；夷白，所期待的是为人能够清高廉洁，不为流俗所污。



童年时代的廖仲恺

究竟怎样才能将自己的儿子培养成为这样的人呢？廖竹宾以为必须节衣缩食，想尽办法让儿子受到良好的教育，特别要对中国的圣贤之书获得明彻的了解。廖仲恺不负其父之望，在旧金山为期近十年的学习生活，始终是“以国学为先”。（《廖仲恺先生哀思录·廖仲恺先生传略》）

1893年，廖仲恺的家庭发生了一场重大变故，这就是

他的父亲突然去世。他的母亲忧伤过度，也病倒在床。廖竹宾生前不过是银行中一名小职员，并没有什么积蓄；孤儿



从旧金山回国时的廖仲恺

寡母流寓在旧金山，无依无靠，生活日益困顿。为了将父亲的灵柩护送回国安葬，使母亲在故乡得到慰藉与依靠，为了让自己返归日夜向往而又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祖国，去继续探索人生的道路，廖仲恺陪伴母亲离开了美国。

汽笛高鸣，开往香港的汽船离开了旧金山海岸。廖仲恺抚摸着父亲的灵柩，回想着父亲的一生，也想到了他在异国所度过的十七个春秋，想到仍留在美国深受欺凌剥削的同胞们，他怎能不心潮起伏，感慨万千！这时一面是渐渐消逝的旧金山海岸，一面是浩瀚无际的太平洋滚滚波涛，廖仲恺耳边又响起了他的父亲经常念叨的那句有千钧份量的话：

“我们是中国人！”

从“国学”转向“西学”

从香港经深圳往东北方向行约一百二十公里，或者从广州往东偏北行约一百五十余公里，便到了著名的千年古城惠州。从惠阳县城再西行约十余公里，便到了廖仲恺的家乡鸭仔步窑前村。窑前村依山建筑，是一个很小的自然村落，不过一、二十户人家，几十口人。

廖仲恺和他的母亲回国后，寄住在叔父家。但刚刚安顿下来，他的母亲就病势加重，离开了人世。父母相继去世，廖仲恺在悲痛之余，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前途，但是刚满十七岁的廖仲恺，特别是他刚回到祖国自己完全陌生的家乡，一切只好听由叔父安排了。

叔父廖志岗在当地有一定的地位和名望，他是继承祖辈遗训，从古书堆中爬到官场的。说起廖氏家族，据《惠阳廖氏家谱》记述，元、明之间，廖仲恺的祖先方才由福建上杭迁至广东兴宁立业；到明代中叶，兴宁廖家的一系迁至归善（即今惠阳），成为惠阳廖氏始祖。客家祖源于西晋末年黄河流域的许多汉人家族，客家话一直保留有较多的汉语古音，他们迁至南方后，继续沿袭着北方的许多习俗，与

当地的原来居民有明显差异。由于他们多迁居于重山叠岭之间，辟林垦荒，艰苦创业，世代相传，故多富有刻苦耐劳、筚路蓝缕的奋斗精神。为在地方上取得引人尊重的社会地位，客家人特别看重读书。各家经济上无论多么拮据，也要设法让自己的子弟进学馆读上几年。只有那些能够讲得经史、做得八股、吟诗作文的人，才有资格在春秋祭祖时参与祭祀，在社会上为人所敬重。廖仲恺的叔父廖志岗既然自认是在这条奋斗道路上的胜利者，所以，他对这个父母双亡的侄子所寄予的希望，便是沿着这条旧路继续走下去。

在旧金山时，廖仲恺已初涉“国学”藩篱。这时，他也认为经史策论的学习，可以打开祖国文化珍宝的大门，便如饥似渴地努力研读，学习的收获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多。

然而，对于正在思考与探索着人生之路的廖仲恺来说，旧学的魅力只不过在短暂的时间中在他身上起一点作用。在海外，美国西部资本主义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在长达十七年的生涯中所获得的切身感受，回国后所面临的满目疮痍的可怕现实，使他很快就发现，在“四书”、“五经”中是找不到改变这个腐朽社会的良方的。甲午战争惨败后，瓜分中国的恶浪，更给了年轻的廖仲恺以强烈的刺激。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在深重的民族灾难面前，旧学是一筹莫展，束手无策。

1895年5月，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提出拒和、迁都、变法三项建议。接着，康有为在京组织强学会，在上海组织强学会分会。维新变法运动急遽高涨起来。同年底，身为

工部主事的康有为回到广州，讲学于广州府学宫万木草堂。这一切，给了与广州近在咫尺的廖仲恺以很深的影响。特别是康有为所提出的“令天下之士皆通西学”的主张，在廖仲恺胸中引起了强烈共鸣。举凡声、光、化、电，各国史、地、政、商，廖仲恺在美国居留期间，已经陆续接触过。康有为的大声疾呼，他自己返国以来学习生活的实践，使他很快就下决心结束目前“国学”的学习，到香港去专攻“西学”。

在叔父帮助下，廖仲恺进了香港英国当局所办的皇仁书院。皇仁书院创办于1862年，原称中央书院，后改称域多利书院，1894年方才改称为现在这个名字。这是一所中等学校，在香港可算作佼佼者，许多英国、中国和侨居香港的他国中产阶级子弟，都在这里就读。1884年至1886年间，孙中山便曾在这里就读了两年半。这里的课程大部分都用英语讲授，也有少量中文课程，教学主要由英国教师担任。所以，这所学校被人们看作是进入港英政府工作的必经阶梯。

在皇仁书院，廖仲恺很快就熟练地掌握了英语，除去听讲、会话之外，还能流利地阅读英文书、报，用英文写作。他也正是在这座完全按照英国模式建立起来的中等学校中，首次较为系统地接受了“西学”的教育。

廖仲恺在皇仁书院学习期间，国内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正逐步走向高涨。据不完全统计，从1895年到1898年，各地创办的学会组织有七十多个，新式学堂五十多所，报刊、书局近百家。这些学会、学堂、报刊、书局都致力于变法思

想的宣传、西学的讲求与介绍。它们有力地促进了维新变法思想的传播,和维新派政治力量的扩大。当时,人们把西学看成西方“致治之本,富强之由”,西书在人们中间受到真诚而热烈的广泛欢迎。许多学会,比如农学会、质学会、算学会、实学会、经济学会、致用学会、公法学会、地学公会、法律学会等,就是专门为讲求一门或几门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学说,而组织起来的。这一风气,给正在努力学习的廖仲恺以很大鼓舞。与内地相比,他的学习,不是借助于那些匆匆译成中文的、差错很多的小册子,而是直接攻读西文原著,在课堂上听取系统的讲授,因而他学习的效果更为明显。

维新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改革封建陋俗,倡导树立新的社会风尚。当时各地出现的戒缠足会、天足会、戒鸦片烟会等等,便是为此而组织的。闽、粤一带的客家妇女,本有保持天足的习惯。这是因为客家人大都依山居住,深壑断崖、羊肠鸟道,三寸金莲无法举足;同时,客家妇女大都直接从事农田耕作,她们甚至常常是农事与家政的主要承担者,忙时耕稼收获,闲时纺纱织布,或者为商店挑运货物,终年劳作不辍,这一切也都离不开天足。正因为如此,把妇女当作玩物的缠足陋习,在客家人中素来沾染甚少。而维新运动则从储人材、强国本的高度,揭示了革除缠足等陋习的社会意义,并通过戒缠足会等团体,公开倡导人们与不缠足的女子通婚,这就给客家的旧传统注入了新的时代内容。廖仲恺,这位风华正茂的翩翩书生,正是从这里进一步增添了